

# 乡村转型发展特征评价及地域类型划分 ——以“苏南—陕北”样带为例

龙花楼<sup>1,2</sup>, 邹 健<sup>1,2</sup>, 李婷婷<sup>1,2,3</sup>, 刘彦随<sup>1,2</sup>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49)

**摘要:**以“苏南—陕北”样带为案例区, 评价分析了该区 2000~2005 年、2005~2008 年乡村转型发展态势, 并揭示了样带乡村转型发展的地域空间格局。结果表明: (1) 2000~2005 年期间, 样带各县乡村发展度普遍较低但转型度普遍较高, 低水平的乡村发展度与较高转型度造成样带各县不同程度的城乡不协调发展; 2005~2008 年期间, 样带乡村系统普遍较快发展, 各地城乡系统间的差异化发展局面得到初步改善; (2) “苏南—陕北”样带乡村转型发展呈现显著的地带性演变特征, 各地转型发展的特征与结果同其所处的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发展模式、政策要求等基本属性相匹配; (3) 基于样带乡村转型发展评价结果, 将样带划分为 8 个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区, 各类型区之间因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差异而选择不同乡村转型发展模式, 并由此驱动资源环境和城乡经济系统的差异性变化。

**关键词:**乡村转型发展; 城乡协调; 评价体系; 地域类型; “苏南—陕北”样带

文章编号: 1000-0585(2012)03-0495-12

## 1 引言

始于 1978 年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中国农村改革促进了农村生产力有效释放, 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sup>[1]</sup>。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 改革重心逐步转向城市领域, 农业和农村改革与发展逐步滞后于工业和城市, “三农”问题逐渐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整体稳定发展的最为紧迫的问题<sup>[2,3]</sup>。进入 21 世纪以来, 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 各地在继续稳步推进二、三产业和城镇发展的同时, 逐步加强了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 并部署“新农村建设”重要战略<sup>[4]</sup>, 积极促进农村生产转型与发展, 乡村转型发展成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sup>[5~7]</sup>。

乡村转型发展, 即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因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组与交互作用, 并由当地参与者对这些作用与变化作出响应与调整而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的重构, 主要涉及村镇空间组织结构、农村产业发展模式、就业方式、消费结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城乡差别等方面的转变<sup>[8]</sup>。我国乡村转型发展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 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乡村发展政策与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借鉴<sup>[9]</sup>, 与全国

收稿日期: 2011-06-15; 修订日期: 2011-12-1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171149、41130748);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 (KZCX2-YW-QN304)

作者简介: 龙花楼 (1971-), 男, 湖南醴陵人, 博士,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乡村发展与土地利用研究。

E-mail: longhl@igsrr.ac.cn

邹 健 (1985-), 男, 贵州赤水人, 从事土地利用与乡村发展研究。E-mail: zouj.08s@igsrr.ac.cn

主体功能区划相结合的乡村转型发展功能区划分<sup>[7]</sup>, 利用“乡村性”指标评价乡村转型发展<sup>[10]</sup>, 乡村发展类型区的划分<sup>[11~13]</sup>, 乡村空间系统研究<sup>[14]</sup>, 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sup>[15]</sup>, 以及乡村转型发展的区域模式<sup>[16,17]</sup>等。本文基于 2000~2008 年“苏南—陕北”样带县域社会经济数据与土地利用数据, 构建乡村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分析该样带 2000 年以来乡村转型发展的时空特征, 并对其进行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划分, 以理清各地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 评判各时段乡村转型发展的优劣, 明确现阶段各地应发扬或改善的发展思路, 促进乡村地域经济<sup>[18]</sup>的又好又快发展, 并为新农村建设的科学规划<sup>[19,20]</sup>及相关战略决策提供参考。

##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 2.1 研究区域

“苏南—陕北”样带(以下简称“样带”)(图 1), 地跨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六省共 53 个县市, 东西长约 1170km, 地跨 12.7°经度, 南北宽约 850km, 地跨 7.63°纬度, 总面积约 7.5 万 km<sup>2</sup>, 2008 年农村常住人口总计约 3738 万人。该样带无论在自然环境要素(地形、降水、温度等)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方面均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 符合 IGBP 陆地样带设置的基本条件<sup>[2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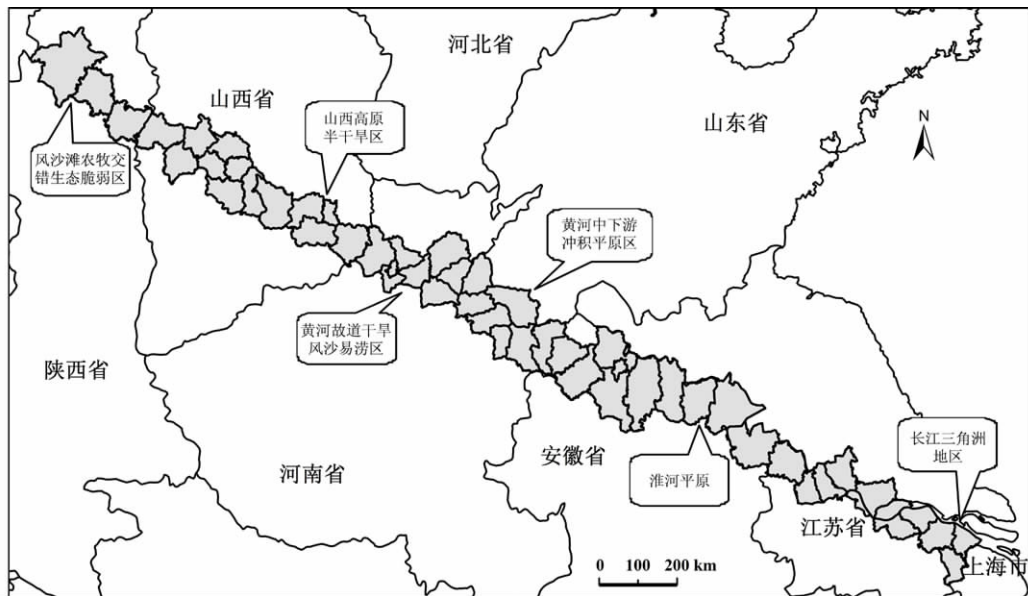


图 1 “苏南—陕北”样带研究区示意图

Fig. 1 The sketch map of the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

“苏南—陕北”样带横跨我国二、三级阶梯, 由东向西经海洋性过渡气候、大陆性过渡气候和大陆性气候三大气候区。降水条件由昆山市 1400mm 年降水量逐步递减到横山县毛乌素沙漠地区的不足 400mm, 由南到北跨北亚热带、暖温带与中温带, 从苏州到榆林年均温逐步由 16℃降低到 8℃。样带地跨六省区, 由东南向西北呈现差异明显的五个经济发展类型区: 苏南外向型经济发展区、皖北苏北传统农区与矿产开发区、豫北农业集中

发展区、晋中矿产富集区、陕北农业开发与生态涵养区。地域差异明显的地形地貌条件、水热条件及由此形成的土壤条件，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共同促成了各地在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生活习俗等方面的极大差异，成为各地区形成不同乡村发展轨迹与转型发展模式的重要基础。由此可见，该样带在深入研究乡村转型发展的地带性格局，揭示我国不同地域类型乡村转型发展的特征及其动力机制方面具有很好的典型性。

2.2 研究方法

2.2.1 乡村转型发展特征评价 本文从乡村发展度（RDL）、乡村转型度（RTL）和城乡协调度（URCL）三个维度出发构建测度乡村转型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sup>[8]</sup>。

表 1 样带县域乡村发展度（RDL）评价指标体系

Tah 1 Indicator system for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RDL) assessment in the transect at county level

准则层	准则层权重	指标层	计算方法	指标层权重	指标说明
乡村经济发展	0.383	国内生产总值水平	国内生产总值/总人口	0.346	正指标
		地方财政支出水平	地方财政支出/总人口	0.278	正指标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总人口	0.214	正指标
		城乡居民储蓄水平	城乡居民存款总额/总人口	0.162	正指标
农业生产发展	0.263	农业产值状况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总人口	0.317	正指标
		农业机械投入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	0.160	正指标
		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林牧渔从业人口	0.302	正指标
		耕地资源支撑条件	耕地资源总面积/总人口	0.221	正指标
乡村社会发展	0.354	社会消费水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人口	0.213	正指标
		通讯设施水平	固定电话总数/总人口	0.173	正指标
		医疗卫生条件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总数/总人口	0.262	正指标
		农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0.352	正指标

表 2 样带县域乡村转型度（RTL）评价指标体系

Tah 2 Indicator system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 level (RTL) assessment in the transect at county level

指标	计算方法	权重	指标说明
城镇化率变化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	0.342	正指标
产业结构变化	一产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	0.331	逆指标
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	乡村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口占乡村总就业人口比重的变化	0.327	逆指标

（1）指标选取与权重：基于上述乡村转型发展评价三个维度，并结合县级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和德尔菲法（Delphi）完成乡村发展度和乡村转型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和权重确定，具体步骤如下：（1）构建备选指标，连同征求意见表通过邮件形式发送给 18 位从事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专家；（2）回收整理有效意见 16 份，确定指标体系，连同打分说明发送给参与第一轮指标筛选并且有回馈的专家；（3）统计第一轮打分结果并再次发送给参与第一轮打分的专家；（4）回收并分析第二轮专家打分结果，发现各指标的标准差皆小于 1，表明专家意见趋于一致，取各指标平均值并计算百分比，最终获得各项指标权重系数（表 1、表 2）。鉴于在我国统计体系中尚未针对县域等级的城乡社会经济统计进行明确划分，本文仅采用“城乡人均收入对比”指标来衡量样带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的城乡协调度。

（2）数据标准化：为消除乡村发展度各指标的不同量纲对综合评价的影响，采用极值标准化方法对各指标数据进行处理，鉴于所选指标对目标层的作用方向都为正，故仅采

用正向极差处理,如式(1)。而乡村转型度与城乡协调度的评价指标均为相对指标,为调整各指标值间的可比性,如式(2)采用一般标准化将各指标值校正到 $[-1, 1]$ 范围,计算综合评价得分时对所有逆指标都乘以负1后再进行加权求和。鉴于样带评价中涉及2000年、2005年、2008年三个统计年份,在标准化过程中为实现相同指标在不同时段的可比性,针对各指标极值都统一采用该指标在三个年份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进行,并采用2000年与2005年、2005年与2008年乡村发展度与城乡协调度得分分别作差,得到乡村发展度与城乡协调度的变化。

$$X'_{ij} = \frac{X_{ij} - X_{i, \min}}{X_{i, \max} - X_{i, \min}} \quad (1)$$

式中,下标 $ij$ 表示第 $j$ 准则层的第 $i$ 个指标, $X'_{ij}$ 为标准化后 $i$ 指标的值, $X_{ij}$ 为处理前 $i$ 指标的值, $X_{i, \max}$ 与 $X_{i, \min}$ 分别为所有年份 $i$ 指标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X'_i = \frac{X_i}{X_{i, \max}} \quad (2)$$

式中, $X'_i$ 为标准化后 $i$ 指标的值, $X_i$ 为处理前 $i$ 指标的值, $X_{i, \max}$ 为所有年份中 $i$ 指标绝对值的最大值。

**2.2.2 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划分** 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即通过乡村地域转型过程与具体发展要素的时空耦合,形成的具有特定结构、系统功能相对完善、地理空间相对完整的乡村发展区域类型。鉴于样带在空间上难以聚团的特点,有别于常用的空间聚类分析方法<sup>[22,23]</sup>,本文针对样带的乡村发展地域类型划分采用相对简洁直观的划分方式(表3),其具体步骤为:(1)将样带各县的初始乡村发展度和乡村转型度按东南—西北向空间顺序排列,以提取相近地域各县乡村转型发展的共性特征,进而揭示样带所在地区乡村转型发展的地带性规律;(2)以其初始乡村发展度和乡村转型度排列的显著拐点为划分断裂点,由此得到地域类型划分结果;(3)参考传统的三段式地域类型命名方法<sup>[23]</sup>,本文采用“四段式”命名法,从“区域地貌—产业特征—转型发展特征—城乡关系”四个方面对各乡村转型发展类型进行命名。

表3 样带乡村转型发展评价的等级划分标准

Tab 3 Criteria for assessing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transect

等级	统计标准	初始乡村发展度范围	乡村转型度范围
低	$(-\infty, \text{均值} - 0.5 \text{ 标准差}]$	$(-\infty, 0.100]$	$(-\infty, 0.120]$
较低	$(\text{均值} - 0.5 \text{ 标准差}, \text{均值}]$	$(0.100, 0.147]$	$(0.120, 0.193]$
较高	$(\text{均值}, \text{均值} + 0.5 \text{ 标准差}]$	$(0.147, 0.194]$	$(0.193, 0.266]$
高	$(\text{均值} + 0.5 \text{ 标准差}, +\infty)$	$(0.194, +\infty)$	$(0.266, +\infty)$

注:考虑各等级在两个时间段间的可比性,等级划分标准同时采用2000~2005年与2005~2008年两个时间段的初始发展度和转型度数据。

### 2.3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需样带各县2000~2008年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并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河南统计年鉴》、《山西统计年鉴》、《陕西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中国自然资源数据库等处进行适当补充和完善。样带涉及各县的发展信息来自各县政府信息网中的相关经济发展资料与政府工作报告资料。

### 3 结果分析

#### 3.1 “苏南—陕北”样带乡村转型发展特征评价

##### 3.1.1 乡村发展度特征

##### (1) 2000~2005 年

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限制, 2000 年样带各县的乡村发展度呈现为普遍较低的水平(图 2A)。乡村发展度较高的县市主要集中于江苏省(太仓市乡村发展度最高,  $RDL=0.294$ ), 以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为基础的苏南地区, 其区域经济的龙头作用对地区农业和农村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保证了自身及周边地区的较高乡村发展水平; 其余省区 2000 年以前市场经济改革仍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 难以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给予有效支持, 其乡村发展度普遍较低, 部分乡村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县市主要集中于商丘( $RDL=0.149$ )、新乡( $RDL=0.093$ )、长治( $RDL=0.076$ )等地市周边, 县域乡村系统发展的基础相对薄弱。

“十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转入快速发展时期, 但 2003 年、2004 年以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仍未能纳入国家发展的战略重心, 经济快速发展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不足, 各地乡村系统发展十分缓慢(图 2B)。乡村发展度增长较快的地区仍集中于各地市周边, 苏南地区拥有相对较好的农业与农村发展基础, 其为适应加入 WTO 后的新形势而大力推进乡镇企业改革, 有效地促进了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 推动了乡村发展度的较快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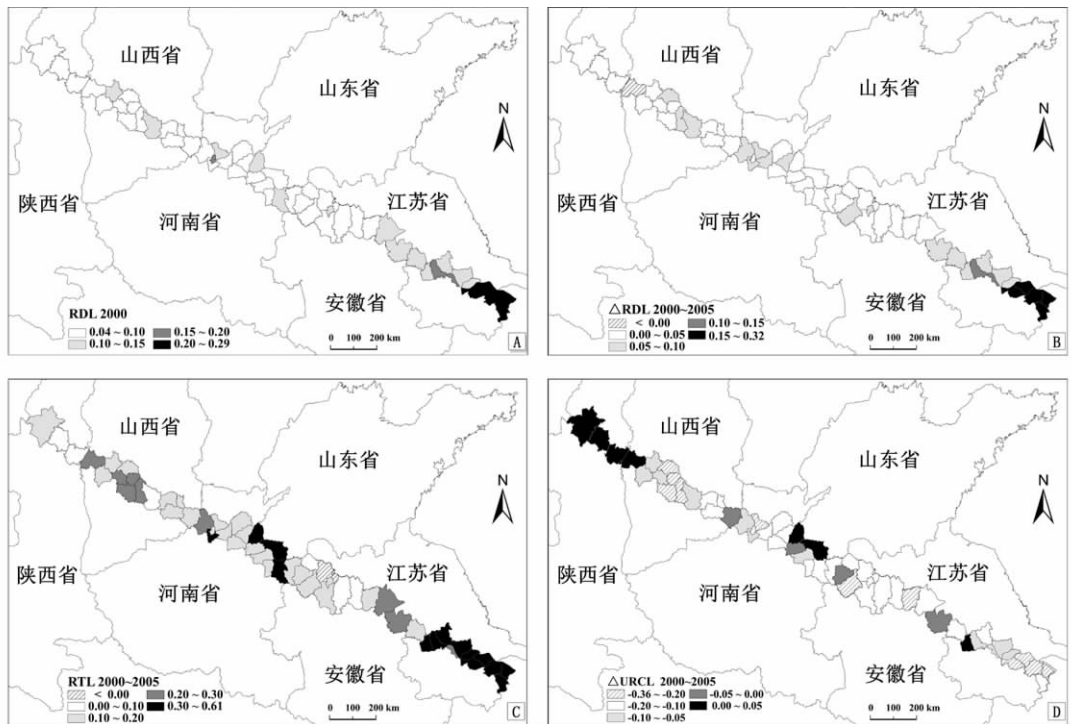


图 2 样带乡村转型发展评价结果 (2000~2005)

Fig. 2 The result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ssessment in the transect during 2000-2005

## (2) 2005~2008 年

“十一五”期间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得到了国家和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随着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等国家政策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样带各县乡村系统普遍的较快发展(图 3B)。就总体而言,苏南及周边地区仍是样带乡村发展度增长最快的地区(昆山市乡村发展度最高,  $RDL=0.588$ ),皖北、豫北地区呈现出整域性的相似增长,晋中、陕北地区乡村发展受资源开发的推动作用较为显著,但县域间的不平衡发展也较为突出。各地不同的乡村发展基础和增长速率,最终造成样带各县乡村发展度梯级变动的空间格局(图 3A),形成样带乡村发展度的三个基础类型区,即:苏南快速增长与高发展水平区、皖北豫北整域稳定发展区、晋中陕北差异化发展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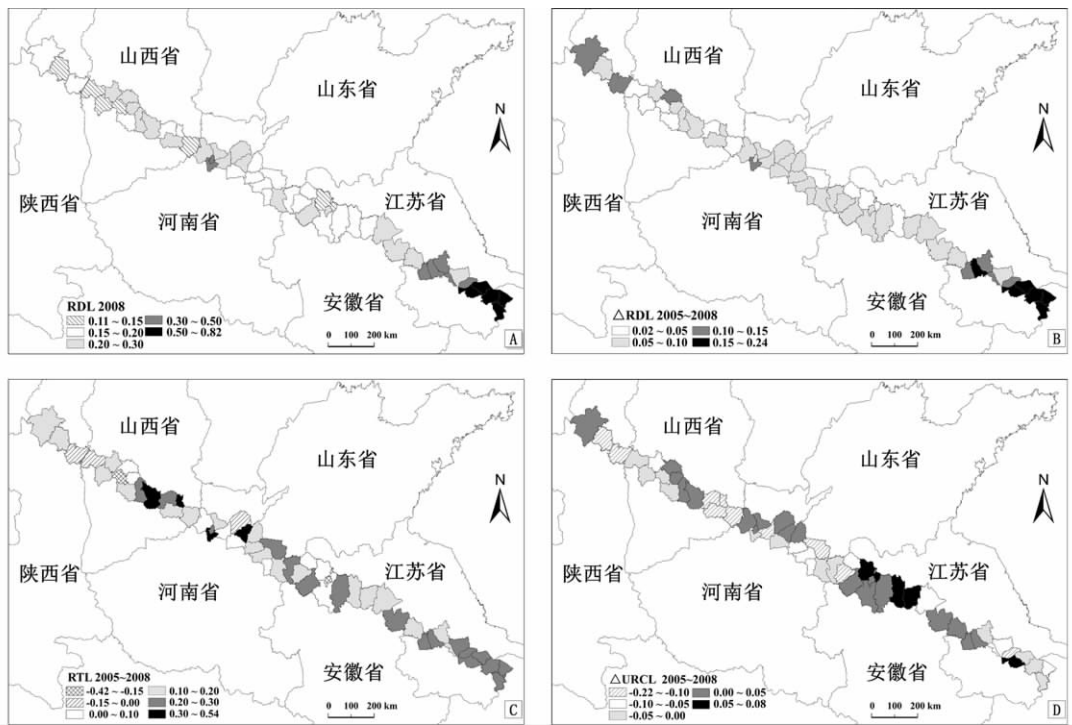


图 3 样带乡村转型发展评价结果 (2005~2008)

Fig. 3 The result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ssessment in the transect during 2005~2008

### 3.1.2 乡村转型度特征

#### (1) 2000~2005 年

与乡村发展度的缓慢增长不同,受国家和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力推动,2000~2005 年样带各县都不同程度地推进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由此造成各县乡村发展过程中普遍较高的转型度(图 2C)。从转型度变化的具体构成上看,样带各县乡村转型的特征也呈现出显著的地带性变动。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改革开放带来的政策优势使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并带来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大幅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快速良性升级,呈现出极高的乡村转型度;皖北、豫北地区乡村转型过程与苏南地区类似,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都呈现良

性调整, 但受地区经济发展基础的限制, 其结构转型的强度普遍低于苏南地区; 晋中地区尽管呈现出一定的乡村转型度, 但其能源生产基地的功能定位使其转型的重点集中于产业结构向重化工业的调整, 即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大幅提升, 而对劳动力具有较大吸纳能力的第三产业发展受阻, 劳动力就业结构未得到显著改善,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地区的转移不明显, 部分县域城镇化水平表现为停滞乃至负增长, 区域乡村系统整体呈现非良性转型的态势; 陕北地区是国家生态退耕政策的核心实施区, 此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心都集中于退耕还林还草及相关工作上, 且在区域社会经济基础较弱、神木煤炭资源开发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尚不显著等因素制约下, 横山等三县的乡村系统转型的外援和内在推动力相对较低, 乡村转型度也相对较低。

### (2) 2005~2008 年

受新农村建设与统筹城乡发展等政策的影响, “十一五”期间各地逐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建设, 盲目的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和农村造成的资源剥夺效应得到有效遏制, 在稳步夯实农业和农村发展基础的同时, 也使得该时期样带各县乡村转型度普遍低于“十五”时期, 良性和稳定的乡村转型成为“十一五”期间各地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主题(图 3C)。

从空间上看, 苏南地区仍是样带乡村转型的龙头地区, 持续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促使其不断推进地区经济结构升级以保持经济增长活力, 而较好的乡村发展基础和产业结构条件又使其难以再进行大规模突变性的改革, 导致其乡村转型度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受中部崛起发展战略推动, 皖北、豫北地区的社会经济改革逐渐常态化, 以能矿资源开发与加工产业及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区域主导产业日趋成熟, 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对稳定, 并未对地区经济整体造成过大波动, 乡村转型度维持在中等水平。

晋中地区产业发展模式未出现显著改变, 以能矿资源开发为核心的重化工业仍是经济发展的重心, 其产值水平受国家能矿产品价格的快速增长而明显提升, 并随着资源城市的发展而出现少量的人口非农化流转, 而区域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 乡村人口的少量流转也能反映为城镇化率的巨大变化。单一结构的快速工业化及相关的城镇化进程推动区域乡村系统非理性转型的进一步发展, 呈现为较高的转型度。

陕北地区生态退耕政策与能源基地建设对区域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并呈现显著的两极分化的发展态势。具体到样带涉及的三县中, 横山县地靠榆阳、神木两经济和能矿开发中心, 受其经济和市场带动作用, 在大力推进生态退耕的同时, 积极依托自身自然环境条件, 大力发展以羊毛生产和大豆种植为主的特色农业与以煤、油开发为主的工业体系, 乡村经济转型兼顾了农业和工业的统筹发展。子洲和清涧两县距榆阳经济中心较远且不具备丰富的能矿资源, 以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发展较慢,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的状态, 乡村经济发展缺乏有效的支点和动力。

**3.1.3 城乡协调度特征** 与乡村转型度的复杂格局不同, 因社会经济发展未能对乡村系统形成有效支持和带动, 2000~2005 年间样带各县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城乡不协调发展(图 2D), 城乡协调度在样带中的空间分布格局并不明显。“十一五”期间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战略和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相继出台和实施, 各地城乡系统间的差异化发展局面得到初步改善, 样带中城乡协调度减少的县域数量和减少的幅度均明显降低(图 3D)。

具体看来, 苏南地区 2000 年以来城乡协调度持续降低, 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外向型经济飞速发展, 带动乡村系统有效发展, 高附加值和高聚集度决定了城镇系统的急速发展, 由此造成的城乡差距的扩大是经济快速发展与转型时期的特定现象, 随着乡村系统

在社会经济中作用的日益凸显,城乡协调度的增长将是必然趋势。

“十五”期间皖北地区因着力发展重化工业而导致城镇系统的快速发展和乡村系统发展的停滞,造成城乡协调度大幅降低。“十一五”期间政府大力支持该地区以商品粮、优质棉、烟叶、薄荷、兔毛等农副产品加工业为核心的特色农业建设,农业发展对地区乡村发展度的推动作用显著,较大地改善了城乡发展关系,促进了城乡协调度的大幅增长。与此同时,转型发展路径相似的豫北地区却未能有效顾及乡村系统的发展,其乡村劳动力就业转移普遍慢于皖北地区,致使农村收入水平难以得到快速提升,城乡协调度持续降低。

晋中和陕北地区城乡协调度普遍呈现持续降低态势,能矿资源开发带来的城镇系统快速发展与乡村系统发展的长期停滞,是造成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

### 3.2 样带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及其发展特征

**3.2.1 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 运用前述的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划分方法,得到样带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划分结果,依次为:陕北黄土丘陵工业化停滞极低转型加速发展城乡关系趋稳区(Ⅰ)、晋中山地能矿驱动超速转型低速发展城乡关系恶化区(Ⅱ)、豫北平原缓慢工业化低速转型平稳发展城乡关系趋稳区(Ⅲ)、豫东平原能矿驱动超速转型停滞发展城乡关系恶化区(Ⅳ)、皖北平原平稳工业化稳步转型加速发展城乡关系改善区(Ⅴ)、苏西平原综合工业化快速转型加速发展城乡关系改善区(Ⅵ)、苏中平原高度工业化转型不足高速发展城乡关系恶化区(Ⅶ)和苏南平原高度工业化高速转型高速发展城乡关系趋稳区(Ⅷ)(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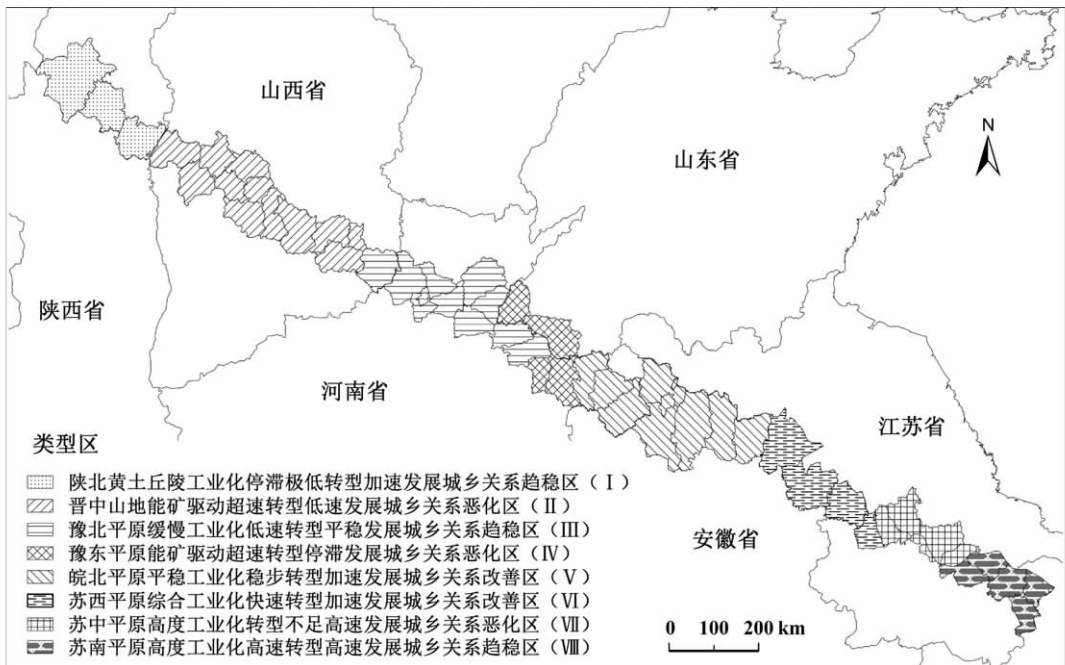


图4 “苏南-陕北”样带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分布格局

Fig. 4 Spatial pattern of territorial typ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transect

**3.2.2 各类型区乡村转型发展特征** 样带各类型区自然资源环境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不同行政区划下发展政策条件的不同,造成了各类型区之间不同的发展速率和转型路



径，由此在转型发展的数理特征上呈现出显著差异（表 4）。

表 4 样带各类型区乡村转型发展的数理特征

Tah 4 Mathema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erritorial typ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transect

类型区（县域单元数）	平均初始 乡村发展度	2000~2005 年			2005~2008 年		
		平均转型度 等级与得分	乡村发展 度均增长	城乡协调 度均变化	平均转型度 等级与得分	乡村发展 度均增长	城乡协调 度均变化
陕北黄土丘陵工业化停滞 极低转型加速发展城乡关 系趋稳区（Ⅰ）（3）	低 (0.046)	低 (0.090)	0.032	0.037	低 (0.037)	0.092	-0.082
晋中山地能矿驱动超速转 型低速发展城乡关系恶化 区（Ⅱ）（12）	低 (0.090)	较高 (0.199)	0.047	-0.158	较低 (0.137)	0.058	-0.063
豫北平原缓慢工业化低速 转型平稳发展城乡关系趋 稳区（Ⅲ）（11）	低 (0.097)	较低 (0.180)	0.050	-0.109	较低 (0.172)	0.077	-0.026
豫东平原能矿驱动超速转 型停滞发展城乡关系恶化 区（Ⅳ）（4）	较低 (0.103)	高 (0.305)	0.025	-0.052	较低 (0.144)	0.061	-0.043
皖北平原平稳工业化稳步 转型加速发展城乡关系改 善区（Ⅴ）（9）	低 (0.085)	低 (0.117)	0.040	-0.155	较低 (0.125)	0.057	0.020
苏西平原综合工业化快速 转型加速发展城乡关系改 善区（Ⅵ）（4）	较低 (0.124)	较高 (0.245)	0.062	-0.056	较高 (0.203)	0.095	0.001
苏中平原高度工业化转型 不足高速发展城乡关系恶 化区（Ⅶ）（5）	较高 (0.155)	高 (0.333)	0.101	-0.089	较高 (0.217)	0.128	-0.057
苏南平原高度工业化高速 转型高速发展城乡关系趋 稳区（Ⅷ）（5）	高 (0.249)	高 (0.479)	0.232	-0.246	较高 (0.251)	0.190	-0.008
平均	0.147	0.193	0.068	-0.122	0.193	0.086	-0.027

陕北黄土丘陵工业化停滞极低转型加速发展城乡关系趋稳区（Ⅰ）紧靠神木和晋中能源矿产基地，但普遍缺乏资源基础，社会经济基础薄弱，以传统农业为核心的乡村经济发展缓慢，经济转型缺乏足够的发展基础与动力支撑。从数据上看，其初始乡村发展度最低，薄弱的乡村发展基础难以支撑较快的经济转型过程，导致其稳定在较低的转型度水平，但其乡村发展度增长由慢到快，乡村系统得到一定发展。其城市居民的收入依赖于榆林市财政转移支付及产业结构缓慢升级而得到了显著增长，超过了乡村发展带来的农民收入增长，导致在城乡收入这单一指标评价下其城乡协调度的大幅降低，但由于其城镇系统与乡村系统都处于低速发展阶段，城乡间发展速度差别不大，城乡关系并未呈现显著的恶化。

晋中山地能矿驱动超速转型低速发展城乡关系恶化区（Ⅱ）是我国最重要的能源矿产

基地,其以能矿资源开发为核心的重化工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在造成较高转型度的同时却未能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有效发展,其薄弱的乡村系统基础难以支撑此转型过程,且以重化工业发展为核心的产业转型难以广泛惠及乡村系统和农民生活,导致乡村系统的发展缓慢与城乡协调度的持续快速降低。

豫北平原缓慢工业化低速转型平稳发展城乡关系趋稳区(Ⅲ)农业发展基础较好且拥有一定的资源和制造业基础,但受区位条件和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的限制,“十五”期间虽全力推进工业化却未能形成高转型与高增长,也忽略了农业发展,造成城乡协调度的大幅减少;“十一五”期间工业化进程仍未能得到显著改善,但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和特色农业发展促进了乡村的更快发展和城乡不协调发展态势的逐步改变。

豫东平原能矿驱动超速转型停滞发展城乡关系恶化区(Ⅳ)以传统农业为重心的经济社会基础薄弱,但受山东省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经济与产业结构受到政策的快速推动,导致其较高的乡村转型度。但快速的工业化过程缺乏足够的乡村发展基础,快速的结构转型却限制了乡村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城乡协调度的持续降低。

皖北平原平稳工业化稳步转型加速发展城乡关系改善区(Ⅴ)乡村发展基础条件薄弱,以资源开发与加工产业发展为主的工业化过程发展稳定,在国家和地方重视农村发展的政策驱动下,其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中表现出对乡村系统和民生工程的持续有效支持,成功实现工业化过程的良性转变,城乡协调度由快速减少转变为较快增加。

苏西平原综合工业化快速转型加速发展城乡关系改善区(Ⅵ)其西部地区承接皖北资源产业与苏南开放型产业的共同影响,区内产业一方面依托皖北资源与重化工业优势,大力发展汽车配件、线缆、化工、机械制造等资源型工业,另一方面更依托苏南外向型经济的扩散带动作用,大力发展纺织服装、食品、医药、玩具、电子等出口型工业,轻重工业的有机融合与快速发展成为该地区的重要特点,导致其更快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更高的结构转型程度,综合型的工业化道路在促进经济整体有序发展的同时,也促使其城乡系统发展更加协调。

苏中平原高度工业化转型不足高速发展城乡关系恶化区(Ⅶ)乡村经济相对发达,受苏南经济扩散带动,以传统乡镇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亟待快速转型以同外向型工业经济相接轨,尽管相对较高的转型政策得以推行,但仍不能满足快速经济发展的持续需求,乡村发展度的增长远低于同期的苏南地区(类型区Ⅷ),且持续关注于工业结构转型及其经济效应的发展轨迹难以对乡村发展带来较大改善,并集中表现为城乡关系的持续恶化。

苏南平原高度工业化高速转型高速发展城乡关系趋稳区(Ⅷ)苏南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十五”期间为保持经济的持续高增长,高速推动乡镇企业改革和乡村发展转型以适应其较高的经济发展基础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求,乡村系统得到极为快速的发展,但快速的结构变迁必然难以全面顾及农村生活的改善,由此导致乡村大发展基础上城乡协调度的极高负增长;“十一五”期间经济高速转型逐渐常态化与综合化,经济快速发展对农村生活的改善作用逐步得到体现,民生产业发展和城乡协调进步逐步受到政策与经济的支持,乡镇企业改革趋于平稳与持续,促使乡村系统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和城乡关系的有效改善。

## 4 结论与讨论

(1) 2000~2005 年期间, 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限制, 样带各县乡村发展度普遍较低, 但各县乡村发展过程中存在普遍较高的转型度, 低水平的乡村发展度与较高转型度造成样带各县不同程度的城乡不协调发展。2005~2008 年期间, 样带乡村系统普遍较快发展, 乡村转型度普遍低于“十五”时期, 各地城乡系统间的差异化发展局面得到改善。

(2) “苏南—陕北”样带乡村转型发展的综合定量评价表明, 样带乡村转型发展呈现显著的地带性演变特征, 各地转型发展的特征与结果同其所处的空间区位、经济基础、发展模式、政策要求等基本属性相匹配。

(3) 基于样带乡村转型发展评价结果, 参考“区域地貌—产业特征—转型发展特征—城乡关系”等属性可将样带划分为 8 个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区。各类型区之间因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差异而选择不同的乡村转型发展模式, 并由此驱动资源环境和城乡经济系统的变化。

样带所代表的特定地域类型区并未涵盖我国乡村转型发展的所有类型, 如京津等快速城镇化驱动型地区、西部特色农业发展型地区等不在本样带范围内, 但均为重要的乡村发展类型区。因此, 针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其余主要类型区, 挑选典型县域或适宜样带开展深入的研究, 完善全国乡村转型发展的不同尺度实证研究体系, 应成为后续研究的重点。

从“苏南—陕北”样带的实证研究结果, 可以总结出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的普遍性特征: (1) 谋求地区经济发展是各地推动乡村转型, 进而实现城乡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 (2) 各地区特定的转型模式、程度与速率只有与当地的乡村经济基础相匹配, 才能促进乡村经济与城乡系统的最有效发展; (3) 传统产业构成了地区社会经济的基础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同时也是各地区推进经济转型的主要障碍; (4) 综合工业化体系的产业带动效应和惠农产业发展更能促进乡村系统的有效发展和城乡关系的长效稳定。

### 参考文献:

- [1] 蔡昉, 王德文, 都阳. 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30 年历程和经验分析.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2] 李培祥, 李诚固. 论城乡互动: 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与对策. 地理科学, 2003, 23(4): 408~413.
- [3] 刘燕鹏, 陈刚, 李立贤. 我国 20 年战略机遇期的“三农”问题. 经济地理, 2005, 25(6): 860~863.
- [4] Long H L, Liu Y S, Li X B, *et al.*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 in China: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Land Use Policy*, 2010, 27(2): 457~470.
- [5] 蔡运龙. 中国农村转型与耕地保护机制. 地理科学, 2001, 21(1): 1~6.
- [6] 刘彦随.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 地理学报, 2007, 62(6): 563~570.
- [7] 文琦. 中国农村转型发展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 19(1): 20~24.
- [8] 龙花楼, 邹健. 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转型发展.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2(4): 97~100.
- [9] 龙花楼, 胡智超, 邹健. 英国乡村发展政策演变及启示. 地理研究, 2010, 29(8): 1369~1378.
- [10] 龙花楼, 刘彦随, 邹健.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地理学报, 2009, 64(4): 426~434.
- [11] 乔家君, 李小建. 基于微观视角的河南省农区经济类型划分. 经济地理, 2008, 28(5): 832~840.
- [12] Lin G C S. Evolving spatial form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01, 53(1): 56~70.
- [13] 程叶青. 东北地区农业地域结构类型划分研究. 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 2009, 25(1): 54~58.
- [14] 张小林, 盛明. 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新定向. 人文地理, 2002, 17(1): 81~84.
- [15] Su S L, Jiang Z L, Zhang Q, *et 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under rapid urbanization: A threat to sustainability in Hang-Jia-Hu region, China. *Applied Geography*, 2011, 31(2): 439~449.

- [16] Long H L, Zou J, Pykett J, *et al.* Analysi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Applied Geography*, 2011, 31(3): 1094~1105.
- [17] 罗守贵, 曾尊国, 王伟伦. 苏南地区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模式探索. *地理研究*, 2001, 20(2): 247~256.
- [18] 乔家君. 中国乡村地域经济论.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19] 刘彦随. 中国新农村建设地理论.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 [20] 鲁奇. 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念与实践的统一.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 19(1): 6~12.
- [21] 龙花楼, 李秀彬. 长江沿线样带土地利用变化时空模拟及其对策. *地理研究*, 2001, 20(6): 660~668.
- [22] 李裕瑞, 刘彦随, 龙花楼. 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格局与类型. *地理研究*, 2011, 30(9): 1637~1647.
- [23] 姚建衡. 农业地域类型划分的聚类分析. *地理科学*, 1988, 8(2): 146~155.

##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rritorial typ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

LONG Hua-lou<sup>1,2</sup>, ZOU Jian<sup>1,2</sup>, LI Ting-ting<sup>1,2,3</sup>, LIU Yan-sui<sup>1,2</sup>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Pushing forwar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key countermeasures to narrow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gap and to achieve the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assessing indicator systems for studying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classifies the territorial typ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The major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1) During 2000-2005,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ies in the transect show a universal low development level but a relatively high transformation level, which resulted in the un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but the situation was improved during 2005-2008. (2) The integrated assessing result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 show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own basic attributes, such as location, economic basis, development mode, and policy objective. (3) Based on the four regional attributes of geomorphological features,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developing speed and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eight territorial type regions are divided in the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 and the research outcomes indicated that various location conditions and resources endowment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contribute to the adoption of different mod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which will result in the different changes i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ystem and urban-rural economic system.

**Key words:**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assessment system; territorial type; the “Southern Jiangsu-Northern Shaanxi” transect